

DOI: 10.13317/j.cnki.jdsksb.2022.005

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演进中的 世界观转向

邵发军, 蒋松伟

摘要:马克思的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于启蒙理性和宗教道德的熏陶之下,发端于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之中,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实践的观点,饱含着对贫苦阶层的人文关怀。世界观初步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社会底层贫困的现实与国家理性的冲突成为动摇他先前世界观的支点。对贫困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逐渐剥离黑格尔“虚幻”的国家外衣,而“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则推动他廓清了思辨的国家理性主义迷雾,逐渐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厘清早期反贫困思想的演进脉络,能够重现马克思彼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整体发展样貌,还原他超越前人思想藩篱的过程;同时,深挖早期反贫困思想演进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线索,能够明晰这一思想的演进与世界观转向之间的复杂联系。

关键词: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演进路径;世界观转向;国家理性主义;理性批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03)

作者简介:邵发军,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蒋松伟,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1-6604(2022)01-0053-13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列宁在20世纪初期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史线索,他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莱茵报》时期“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①,即张一兵认为的“一次革命性转换中的两个转变”^②。随着对马克思遗存文本的发掘广度、研究深度的增进,不少学者对列宁论断中的“一次转变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认为马克思的早期世界观经历了“两次转变”或“多次转变”,抛开这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3.

② 张一兵.探寻青年马克思早期哲学构境的复杂线索[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3):5-10.

一学术争议,列宁“两个转向”说还是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并业已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史研究中的主流观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马克思早期世界观转向的研究抱以极大热情,并开辟出不同的解读路径,如段虹通过对马克思人学思想发展逻辑的分析来观测其早期世界观的转向^①;涂用凯从马克思实践观的转变过程中探讨其世界观的转向问题^②;杨耕曾指出:“《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③。马克思毕生的追求都是围绕着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展开的,纵览马克思的生平可以发现,现实中的贫困问题正是他投身政治实践的策源地,反贫困思想作为马克思早期政治实践的重要课题,无疑与他这一时期的世界观转向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故而早期反贫困思想的演进逻辑应当作为研究马克思世界观转向的一条进路。然而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此所作的研究与分析却较少,这就使之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故而,遁入文本而“深耕”马克思世界观转向途中在场的早期反贫困思想,以求还原思想转变的历史原像,未尝不是一种应然的研究范式。同时,这一范式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马克思揭示贫困根源、探寻人类发展出路的突破口,即私有制下形成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分裂,进而导致非正义的社会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异化现象。

一、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的世界观转向“基因”

马克思最早在《莱茵报》时期的两篇政论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对现实贫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作为步入社会不久的唯心主义哲学博士,他之所以能够选择与同时代人以精神视阈为批判场地所不同的、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现实批判路径,与他早期经历的启蒙思想、浪漫主义、法哲学等思想熏陶是分不开的,这些来自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因素,已经内化为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基因”。换言之,启蒙理性的基因正是指引马克思反思贫困现实问题、进而建构新世界观的锁钥。杜利娜认为,“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是从对贫困现象的感性认识开始的”^④,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不难发现,贫困现象最初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理性现实出现在马克思的视野之中,之所以能够引起他的关注,更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哲学和政治上的理性批判活动。明晰早期反贫困思想与世界观转向之间的联系,就有必要对前者演进的各个阶段加以准确把握。换言之,只有厘清散落在早期文本当中的反贫困思想酵素,才能更充分地把握马克思在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的精神方向。

(一) 启蒙教育中的理性与宗教道德

科尔纽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卡尔·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

① 段虹.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与其人学思想的发展[J]. 理论探讨, 2001(4): 46-47.

② 涂用凯. 马克思实践观的最初探索与世界观的转变[J]. 科学社会主义, 2010(5): 132-135.

③ 杨耕. 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探微[J]. 北京社会科学, 1996(3): 27-33.

④ 杜利娜.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8): 31-40.

环境”^①。从历史背景来看：一方面，马克思出生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滞后，封建统治下的宗教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德国仍然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地处德法交界，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影响，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性思想较为盛行，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接受了最初的思想启蒙。在家庭、学校的熏陶和教育下，他既受到来自基督新教精神的洗礼，又与这一时代思想的突破口中涌现出的道德伦理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同向而行。在马克思中学时期的考试作文里，我们不难发现他在启蒙阶段的一些思想足迹。在宗教作文中，马克思认为应当从人的本性来考察信徒同基督结合的必要性，并得出“因此，我们的心、理性……告诉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绝对必要的”^②的结论。马克思在这里把理性视为人的本性，显然是受当时德国哲学界主流的康德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将人的理性引申出的德行视作带有局限性的世俗的德行，认为“一切德行都是出于对基督的爱”^③的观点，则表明他在启蒙阶段的世界观中还存留有宗教道德神学的痕迹，大体上属于启蒙理性主义和宗教道德神学的混合体。

在另一篇德语作文中，马克思谈到了关于职业选择的思考，他认为应当将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作为选择职业的指针，并在文末树立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和牺牲的崇高理想。无疑，这一理想在树立之时深受宗教神学的救世情结影响，本质上是理性主义道德神学中的美德和理想的抽穗；同时，这一理想中内含的全人类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又与马克思在此后反贫困实践中呈现出的对“贫苦阶级”的扶助意识具有一定的同向性。此外，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曾呼吁道：“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④这种强调人的理性判断和独立思考的启蒙理性主张，既是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中不容忽视的思想质素，也是他此后敢于对“完满无缺”的黑格尔绝对理性和“根深蒂固”的现实贫困问题这“两座大山”做出反叛，提出改变世界、消灭贫困任务的深层次根源。总体而言，马克思在启蒙理性、宗教道德思想的灌溉和滋养下，树立起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其中暗含的面向大众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基因”，作为启蒙世界观中零散的思想酵素，与这一理想并在于早期反贫困思想的孕育阶段。同时，这两种带有反贫困色彩的思想酵素，在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的“搭桥”下，必然地联结在一起，并激发出推动世界观转向的潜在性力量。

(二) 浪漫主义创作中的反讽与实践性

启蒙运动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蒙昧，然而随

① 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 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5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1.

③ 同②：453.

④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何兆武，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22.

着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扩张欲望下的迅猛发展,人们却逐渐陷入对理性的盲目崇拜之中,其结果是启蒙运动的主张不断趋向于一切事物的理性化,导致通过想象、直观、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进行创作的文学、艺术等领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诋毁和冲击。于是,以反对机械式的、绝对化的理性主义为目标的浪漫主义思潮涌现出来,并逐渐表现为对启蒙运动的质疑和反叛。马克思同样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交往中产生了对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爱好,在波恩大学就读期间,他的文学创作爱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马克思的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作于1836年秋末的三本诗集《爱之书》第一、二部和《歌之书》,是他献给不久前与自己私定终身的未婚妻燕妮的,随着他转赴柏林求学,正值热恋期的两人又匆匆分隔两地,故而上述创作大抵是为了歌颂爱情和倾诉思念。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也写道:“对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①除了表达爱、直观、幻想等浪漫主义文学的感性要素以外,他的创作中还大量运用反讽的表达方式,其中不乏对黑格尔哲学的晦涩、对德国社会中蔓延的空谈理论等的讽刺和抨击。

浪漫派反讽的要求仅限于调整和改变主体的心态,这就为个体挣脱机械单调、艰难痛苦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条精神上的“解救”之路,本质上是利用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堆砌出一座虚幻缥缈而又充满诗意的空中楼阁。马克思的反讽创作固然属于浪漫主义的审美维度,但同时又超越了浪漫主义的审美要求,正如他在讽刺诗中所表达的,自己并不期望能够像康德和费希特一样“在太空遨游”,而是“只求能真正领悟在街头巷尾遇到的日常事物”^②。刘森林也指出,马克思的反讽“是通过实践行为实际地变革客体世界来强烈地表达一种对经验现实的反讽”^③。这种具有实践性的反讽表明,马克思绝非一个纯浪漫主义者:一方面,他并不满足于精神上的空洞体验,而是始终怀着一种对粗糙尘世的关切,他所追求的是客观现实的浪漫化、理想化;另一方面,他没有因循浪漫派的自我“得救”,他的浪漫主义主体已经从孤独的个体迁移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群体,无疑,愈发广泛、深陷贫困泥潭的、困顿和无奈的贫苦群众正是这一主体。作为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的重要思潮,浪漫主义对马克思的行文方式、思想变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浪漫主义反讽的实践性,不仅显露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而且内在要求他寻找为绝大多数人变革世界的历史主体,这无疑是其此后世界观转向的潜在推力。

(三) 转向现实本身的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

在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6.

③ 刘森林.反讽、主体与内在性——兼论马克思哲学中的反讽维度[J].现代哲学,2006(5):18-27.

了”,自己正在与客观的现实世界渐行渐远,同时他也逐渐理智地看到,自己一度倾注心血的浪漫主义创作实际上并不成功,以至于在真正的诗歌王国面前,“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乌有”^①。浪漫主义割裂理想与现实的空洞本质在此时已展露无遗,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理想主义作为他“最神圣的东西被毁掉了”,他决定“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②。相较于浪漫主义空洞的理想化和消极的避世态度,黑格尔“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③无疑更接近于现实本身,尽管后者一度为马克思所厌恶,但却是他通向改造现实世界的理想所无法绕开的思想之路。在黑格尔思辨的精神哲学中,“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于是“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就是在自身”^④。先前困扰马克思的应然与实然间的绝对对立在抽象的异化概念中得到了混合性的统一,这就为他暂时“填平”了因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思想裂隙。在施特拉劳休养期间,马克思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同时在与“博士俱乐部”接触的过程中,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一道,在批判地探讨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改造和发展自身的世界观。

“在当时德国的理论生活中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⑤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长期表现出一种软弱性,故而尽管青年黑格尔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的代表性力量,但其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更多只是依附于宗教批判这种思想斗争形式来进行的。受鲍威尔的影响,马克思对主张自我意识自由的希腊哲学产生研究兴趣,在博士论文中,他肯定黑格尔对希腊哲学体系一般特点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思辨的观点造成黑格尔对自我意识哲学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从自然哲学角度分析指出,原子作为个体的物化形象,其偏斜运动表明人的自我意识在否定外在客体局限的过程中具有自由的张力,但他不同意伊壁鸠鲁就此而追求的思想逃避式的纯粹心灵自由,而是赞成青年黑格尔派通过哲学批判来改造外部世界的观点。同时,马克思反对一味地将自我意识片面抬高,指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⑥,这种建立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初步扬弃之上的具有唯物主义实践底色的、辩证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是他在此后的反贫困实践中所秉持的。此外,马克思在论文序言中还强调了普罗米修斯关于自我意识高于神性的自白,这一神话人物本身所象征的为人类解放而牺牲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正是与启蒙世界观中的全人类意识一脉相承的反贫困思想“基因”。在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扬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2.

② 同①:12-1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89.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72-273.

⑤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146-147.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

中,马克思基本确立了此后参与政治实践的方法和立场,同时,这也为其世界观的转向奠定了潜在性的基础。

二、早期反贫困思想生成阶段世界观的舍弃

从早期反贫困思想的孕育阶段来看,宗教道德神学中的救世情结、启蒙理性中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对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倾向产生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浪漫主义思潮使他朦胧地意识到,个体的精神解脱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理想王国,现实中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贫苦群体才是亟待被“解救”的主体;在面向现实的黑格尔理性主义指引下,他认识到国家作为普遍理性的伦理实体,能够整合、改造“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现实。上述思想质点共同勾画出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的基本脉络,并为其思想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民主主义政治立场注入了实践性和革命性的转向性因素。在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统治、追求自由主义的批判道路上,青年黑格尔派将人的自由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的理性,将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作为批判现实的哲学武器。随着普鲁士的王权更替,新国王威廉四世在继任以后变本加厉地实施反动统治,“迫害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就成了他的政策的第一批牺牲者”^①。由于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获得博士学位后的马克思原本想要担任教职、从事学术的想法因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离职而落空。1842年5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完全投入到“哲学世界化”任务的政治实践当中,随着对社会现实矛盾,特别是对贫困问题的深入接触,他建基于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之上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激烈动荡。

(一) 现实政治批判中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怀疑

伴随批判情境由纯粹哲学向现实政治的转换,非理性的现实问题在马克思的报刊编辑工作当中接踵而来。面对普鲁士政府颁布的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十分愤慨,他从政治角度出发,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并由此论证了“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的必要性^②。通过列举新法令规定中的种种非理性矛盾,他反复强调,“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作为检查书报标准的内容和形式都已经被书报检察官本人的理智所取代,就连“作者的倾向”这种“无定形的意见”也成为被审查和判断的对象,从而揭露出新法令本质上的伪善性,即“是建立在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③。针对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马克思进一步从哲学角度分析了出版自由的必要性,他指出:“新闻出版是个人表达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式”^④。在

① 奥古斯特·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 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1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③ 同②:133.

④ 同②:196.

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视阈中,“国家……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①。故而新闻出版是个人为实现与国家的联结,将自我意识中的现实物质利益斗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理性斗争的“普遍纽带”。然而,无论是新的书报检查令,还是省议会的辩论结果,都表现出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和否定。黑格尔所推崇的“普遍理性”在新的书报检查制度中被扼杀,这对马克思所秉持的哲学信仰发起了挑战,马克思也由此开始了对先前自己所倚靠的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反思。

马克思意识到,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和莱茵省议会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立法和辩论中,暴露出与国家理性背道而驰,或者说是反国家理性的本质面目:一方面,新的书报检查令不允许作者表达对统治者及整个统治阶级的任何怀疑,这就表明实施立法的实存的普鲁士国家已经丧失了理性的本质,其统治本质是封建束缚的高压专制,而非理性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省议会辩论的过程中发现,“为新闻出版辩护的人,总的说来对自己所辩护的对象却没有任何现实的关系”^②,代表普遍意志的出版自由,其辩护人却不具备应然的普遍性和真实性,这不仅是辩论结果倒向反对新闻出版自由一方的重要原因,而且还反映出实存的莱茵省议会并非人民行使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基本保证,而是被狭隘的特权等级所操纵的虚假躯壳。在种种非理性的政治现实的冲击之下,马克思以国家理性主义为基点的世界观发生动摇,顾海良指出,“马克思这时开始怀疑现存的国家是否是理性的体现”^③。在对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重新思考中,现实中突出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贫困问题,必然地成为马克思再度考量国家理性的标尺。在政治实践中所直面的实存普鲁士国家的非理性政治现实,对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的生成起到了刺激和催化的作用,同时,马克思原本将“哲学世界化”任务寄托于国家理性的世界观逐渐走向幻灭,其世界观的转向也开始由此前的缓慢发展过程进入到加速阶段。

(二) 贫困现象研究中对现实政治认识的深化

最早呈现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的贫困现象是莱茵省持续存在的贫民“盗窃”枯枝的情形。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在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交错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小农、短工和一部分城市居民被涤荡到改革进程的边缘。在出卖地产以赎免封建义务的政治改革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扩张的双重盘剥下,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一无所有。贫民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去捡拾枯枝,当这一行为被林木所有者通过立法确定为“盗窃”后,却仍有越来越多的贫民为了生存而不惜铤而走险。面对“林木盗窃”背后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状况,马克思在愤慨之余,更为省议会立法的“吃人”性质而感到震惊,他通过“枯枝”和“树干”这对自然形象进行尖锐讽刺:被剥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5.

③ 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9.

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穷人,就如同自然界中微不足道的树枝,因被折断而失去了与一切天然生存要素的有机联系,最终成为无机的枯枝,而折断树枝的天然力量,正是来自对大自然养分进行贪婪掠夺的树和树干;相较于形态上零散短小的树枝,粗壮高大的树干则具有明显的天然优势,但其仍不遗余力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①。私有制度下,林木所有者显现出疯狂的逐利行为,就连“枯枝”这种微不足道的“附属品”,也成为其不愿放弃的占有对象,贫困现象中呈现出富人驱逐穷人的现实政治景象。马克思世界观中所遵循的“普遍理性”原则,在私有制下特权等级对底层贫苦等级的非道德的掠夺和压迫面前遇到了危机,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决心成为“不实际的人”,“为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②争取法权,这是他第一次公开站在具有“无产者”性质的贫困群体的立场上参与政治斗争,这也意味着他开始了对先前世界观的正式批判。

相较于“盗窃”林木的贫民,摩泽尔河沿岸已经或濒临破产的葡萄种植者则表现得更加“温和”一些,他们将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寄希望于行政当局的举措,但最终仍未能摆脱悲惨的处境。《莱茵报》记者对农民的贫困境遇和政府的冷漠态度进行了实际报道,然而这不仅没有使贫困问题得到政府的重视,而且连记者本人也反遭政府官员的诘问驳难。在无人再敢论证报道观点和内容真实性的情况之下,马克思果断站出来进行辩护,这也推动了他对贫困现象的深入研究。面对总督冯·沙培尔的施压以及报社提出的举证要求,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调查,他发现,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存在长期、普遍的贫困问题的调查结果,始终被官方发言人予以否认。由于长期普遍的贫困境况具有“特殊性质”,葡萄种植者只能依赖自由报刊的舆论性质来造势,以求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与帮助,然而行政当局采取的“特殊措施”,以及对“自由报刊”加以书报检查的限制,都无疑对“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③造成了阻碍。行政当局对贫困问题的掩饰和无视,使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统治阶层各环节的认识,这也为他溯源贫困现象成因、剖析贫困问题本质奠定了基础。同时,立法机构和行政当局在面对贫困现实时所表现出的与国家理性主义的背离,进一步加深了马克思对实存国家的失望和怀疑,黑格尔所谓的“国家理性”与现实的贫困显得格格不入,这无疑再度加速了他对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反叛,同时,他的政治立场在为贫苦群众的斗争中也显露出初步的“共产主义”倾向。

(三) 贫困本质的揭露与对国家理性主义的否弃

在对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的调查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对贫困问题的成因及本质展开分析,他列举了“修道院被废除”的例子:“修道院的财产”在宗教改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② 同①:248.

③ 同①:381.

过程中被收归俗用,变成了特权等级的“私有财产”,然而,穷人先前赖以生存的宗教救济,却同样被贵族特权者无情剥夺。马克思意识到,“林木盗窃者”的贫困成因来自贵族特权者的残酷剥削,而这种剥削已经从传统封建制度中的身份压迫演变为“市民社会”中“合法的”强行占有。通过对贵族和贫苦阶级两种不同习惯法的考察,马克思指出,枯枝的掉落具有“自然发生的本质”和“偶然存在”的特点,故而其本质上“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于是穷人就享有捡拾它的自然权利,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自然权利早已演化成为穷人的习惯法,故而贫苦阶级的习惯是“实际的和合法的”,其“习惯法的形式……更是合乎自然的”^①。而贵族特权者所要求的“习惯法”,本质上是对贫苦阶级先占权的侵犯,是特权等级为谋取“特定种”的利益而制定的有悖于法的理性精神的“动物形式”的恶法。同时,马克思指出,“明智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惩罚罪行”,然而,现实中的立法者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仁慈之心,反而只会通过一味加重惩罚的方式来对待“仅仅由环境造成的过错”^②。这种非人道的、违背法和道德理性精神的立法,只会使贫民变成“非人”的实质形态,是特权等级对法和国家权利的窃取和对理性的践踏。“普遍理性”在与“私人利益”的现实较量中不断落败,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于是,马克思开始从国家机构本身进行反思,这也推动他突破了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面对摩泽尔河沿岸的贫困现象,马克思批判的笔尖直接对准了普鲁士国家的官僚制度及其下属的官僚群体。农民对自由报刊的迫切需要是由贫困状况本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而这一特殊性质,正是由行政当局对贫困现实的否定和对农民求助呼声的无视所导致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③贫困的起因与市场变化的冲击和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歉收不可谓没有关系,但最终发展成为普遍的、长期的问题,则应归咎于管理机构的官僚本质。首先,官员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而否认并隐瞒贫困的现状,并且对农民的“求救行为”处处设阻;其次,当面对难以否认的贫困事实时,管理机构及其官员囿于成见,将贫困的成因推诿给自然和私人的因素;最后,长期根植在管理机构内部的官僚关系是无法消除的,继任官员为了维护其前任上司的治理观念,根本无法对管理工作做出实质性改革。按照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表述:“国家的意识和最高度的教养都表现在国家官吏所隶属的中间等级中。”^④而实存的官僚等级在治理贫困问题时,只会就其自身及其所维护的利益出发,无视和遮掩贫困问题本身,不但未能起到代表国家意志的作用,而且还固化成了对抗民众意志的等级,这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异化的表现。实存的法和国家在贫困问题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253.

② 同①:254.

③ 同①:376.

④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57.

显露出彻头彻尾的窘态,官僚等级也并非联结国家与底层人民的“中介”,一切理性的东西都已经被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左右。贫困现实的本质使马克思对实存国家感到彻底失望,在为“贫苦阶级”寻求新的解放途径的同时,他在思想上开始了对此前以国家理性为基点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否弃。

三、早期反贫困思想发展过程中孕育的世界观转向

从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的生成过程来看,最初在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治实践中,省议会立法的非理性和代议制度的虚假性使他产生了对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怀疑,同时,这也推动他深入到现实矛盾的研究之中,贫困问题作为那一时期突出的社会矛盾,必然地成为他考察和批判的对象;按照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主张,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即通过理性批判实现对国家机体的改造,从而使国家回复到自身,即达到“绝对精神”的阶段;随着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揭开了现实贫困的成因及其本质,并认识到法和国家在“物质利益”面前的“失语”、代议制度和行政官员成为“物质利益”的傀儡,超越绝对理性的“物质利益”使他完全陷入怀疑自己一度所抱持的国家理性主义信仰的痛苦的精神漩涡之中。此外,“贫苦阶级”的广泛性及其贫苦遭遇的长期性也使马克思逐渐意识到,贫困现象即是新的等级压迫的外在表现,实存的法和国家并非普遍的“绝对理性”,而倾向于“无产者”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也内在推动他为这一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

(一)“物质利益难题”下的唯物主义转向

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在贫困现实中暴露出其力量上的局限性和理论上的虚幻性:实存的普鲁士国家并非被道德和理性所承载,而是被贵族特权者的私人利益和僵化的官僚制度所左右;从抽象的精神领域出发,根本无法撼动私人和国家的行动以及贫困问题背后异化的社会治理关系。尽管黑格尔承认贫困问题的解决始终“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①。然而在其“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整体架构中,贫困问题仅仅只是作为市民社会环节中的一个难以解决的“苦恼”,且能够在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环节之后得到消解。实存的普鲁士国家在贫困现实中所展露出的颠倒了的黑格尔理性国家图景,无疑是对这种从单纯政治构想出发的抽象思辨方式的虚无性的确证,马克思在这里愈发感到自己一直以来所期望通过哲学理性批判来达至的理想王国目标再一次落空。同时,在立足于贫苦阶级立场上的反贫困政治实践中,马克思对于社会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基于不同等级对待新闻出版自由的态度差异,他初步意识到等级地位对于辩论者行为的影响作用;在针对“林木盗窃立法”的批判中,他进一步抓住决定省议会立法的各等级代表窃取国家权利行为的狭隘的“私人利益”;在研究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时,他已经注意到无处不在的“物质利益”,并由此指出存在着不以人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78-279.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一方面,马克思在这时已经意识到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某种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客观关系出发来探究现象的本质,逻辑性地透射出他与黑格尔从精神领域出发来解释世界所不同的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

然而,由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总体上仍处于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笼罩之下,故而他无法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真正科学的评判,马克思后来也谈到了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①。随着反动政治形势日盛,马克思辞去了《莱茵报》的主编职务,并于1843年5月转赴克罗茨纳赫,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带着对“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惑,首先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审查。通过对法、英等国历史的比较性研究,以及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批判,马克思对现实政治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对贫困问题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尽管此前困扰他的“难事”仍未得到解决,但他已开始意识到自己此前一直兜转于虚幻的“天国”之中,而答案却始终存在于粗糙的“尘世”之间,并由此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批判性研究。杨耕也指出:“历史研究、政治批判和哲学批判的‘三位一体’构成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理论途径或内在机制。”^②正是在早期反贫困思想的引导和助推下,马克思逐渐走上否弃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建构新世界观的理论探索之路。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中所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推动他转而探究“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一本源领域,并逐渐形成基于这种本源性批判的理论自觉。正是这种触及社会物质基础的本质性批判,推动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领域艰难的理论探索中,进一步明确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最终拨开了遮蔽现实生活的虚幻的精神面纱,将“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国家绝对理性的统摄中解放出来,并由此打开了“新世界观”的大门。

(二) 探索反贫困路径中的共产主义转向

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在反贫困实践中暴露出其内容上的苍白和本质上的无力:基于对社会关系客观必然性的初步认识,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城市、乡村和诸侯”这些不同等级的代表在面对林木盗窃法草案时的争论、官僚等级在面对贫困问题时的冷漠态度和无能行为及其根深蒂固的官僚等级制度,本质上都是由各自不同物质利益所决定的。理性批判无法撼动特权者及各等级基于物质利益的要求,私有制下的行政官员根本不具备应有的良心,马克思朦胧地意识到,正是私有制折断了贫民的“手脚”,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桎梏。同时,等级制度中“贫苦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断受到排斥和挤压的政治状况也引起马克思的重视,作为最广泛群体的“贫苦阶级”,甚至无法将自身的贫困境况诉诸理性,等级鲜明的代议制度已然变成了等级压迫的手段。正如刘同舫所言,“启蒙理性具有全人类性,是一种大众理性……但是,启蒙理性的发展却背离了这种美好的初衷,从大众理性走向了精英理性”,在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中,启蒙理性无疑丧失了其服务于所有社会成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② 杨耕.马克思世界观转变探微[J].北京社会科学,1996(3):27-33.

的全人类性,并化作由特权等级所把持的为少数人的利益作辩护的“一种新的更加隐蔽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精神基础”^①。革命民主主义通过理性批判所追求的政治解放,在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束缚的同时,衍生出更加隐蔽的等级压迫关系,即旧的贵族特权等级、新兴市民阶层对“贫苦阶级”的新的等级压迫,而这种等级压迫所造成的贫困的境遇,正是在抽象的精神领域内对人的自由实现的新的束缚。由此,马克思在其早期反贫困思想中产生了对自己先前所抱持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怀疑。

等级压迫的政治现状使马克思意识到,表面上日益加剧的贫困问题,实质上则是“贫苦阶级”与特权等级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是封建和僵化的统治阶层与人民关系的异化,故而依托于国家普遍的绝对理性,无法达到对实存的法和国家的社会改造。同时,这种由“人为”所造成的贫困问题,也使马克思潜在地意识到占绝大多数的“贫苦阶级”的苦难境况,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等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避免的“泥淖”,故而革命民主主义所主张的民主和革命本质上都具有狭隘性和虚假性,即仅仅是对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这推动他去寻求更具革命性与实践性的主体和新的反贫困途径。随着德国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德国社会中日益流行的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在与《总汇报》的论战中,尽管马克思并不认可“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但这却表明他此时已经开始关注这些为“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权利的学说^②。同时,“捡拾枯枝”和“四处求救”的“贫苦阶级”为改变自身贫困境况所做出的挣扎与反抗,使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这一实践主体对于变革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在这里,他初步完成了对“贫苦阶级”的历史革命主体的定位。此后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人类历史研究中,马克思进一步确证了革命的历史主体正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他在写给卢格的信中指出,实存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抽象性、教条性和片面性,故而仍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但他提出“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③,这表明他已经打算创立某种更具实践性、科学性的革命学说。换言之,马克思在对反贫困路径的探索中进入到创立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早期准备阶段。

四、结语

马克思早期反贫困思想的孕育、生成及发展与他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形成及转向有着密切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所指向的“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及其对此的反思,成为马克思早期国家理性主义转向的决定性酵素;作为共产主义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意识的锻造,二者都受限于私有财产所规制的贫困的历史地位,从此而论,马克思的早期反贫困思想就成为其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萌芽、形成的不可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① 刘同舫.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4-2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92-2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64.

马克思起初在宗教道德神学和启蒙理性精神的熏陶下,决心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这一理想中闪烁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微光,正是早期反贫困思想孕育阶段潜在的思想酵素;完成思想启蒙后,他开始了建构“理想王国”的初步探索,在理想本身的现实性要求下,他逐渐从空洞的浪漫主义中醒悟,转而向黑格尔法哲学寻求答案;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强光暂时遮蔽了此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隙,马克思由此走上了反对宗教束缚及封建统治、高扬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的理性批判道路,并逐渐形成带有理性国家色彩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立场。之后,在直面新闻出版自由的政治实践中,马克思对实存的法和国家理性开始产生怀疑,他先前信奉的国家理性主义发生动摇,当贫困现象进入到政治批判的视野后,他对法和国家的认识发生急剧变化,早期反贫困思想在维护“贫苦阶级”利益的反贫困实践中生成并迅速发展。此后,通过对棱角分明、矛盾尖锐的贫困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社会并非黑格尔所谓的被理性“过滤”后的纯粹“定在”,而是被贫困问题撕裂开来的“物质利益”的角斗场,局限于抽象精神领域的自我意识运动,本质上是脱离现实的“头脑风暴”,故而根本无法触及苦难的贫困现实,这也使他意识到,黑格尔的国家理性主义已经变成了统治阶级麻醉贫苦阶级的精神学说。至此,马克思开始了对黑格尔国家理性主义的反思、否弃和对反贫困路径新的探索,他的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也正式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

(责任编辑:张向凤)

On the World Outlook Turn in the Evolution of Karl Marx's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Shao Fajun, Jiang Songw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Growing within the environment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religious morality, Karl Marx shaped his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from hi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is thought was characterized with practical views and humanistic care for the poor. Marx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egel's national rationalism during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his world outlook, 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eality of poverty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national rationality became a turning point in his previous world outlook. In his study of poverty, Marx realized the "illusory" nature of Hegel's national rationalism. His thinking of "material interests" made him finally give up national rationalism and gradually turn to materialism and communism.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his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s can not only reprodu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arx's worldview and political stance in his time, but also provide a clear picture of how he surpassed the ideological barriers of his predecessors. Meanwhile, only by exploring the clues of materi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evolution of Marx's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can we finally clarif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his anti-poverty thought and the change in his world outlook.

Key words: Karl Marx; early anti-poverty thought; evolution path; world outlook turn; national rationalism; rational criticism